

三民主義倫理學與社會行為之關係

李光太

壹、前言

三民主義倫理思想是 國父因襲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並擷取西洋精華的倫理思想，再加上先總統 蔣公闡揚創造的倫理思想融鑄而成的思想體系。故三民主義倫理思想所闡揚的乃是中國傳統以仁愛為基礎的博施濟眾、推愛及人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洋「互助」、「博愛」倫理思想的精華。因而表現出重視人類尊嚴，珍貴人類價值的人本思想；強調以服務利他、尊重人生的倫理觀念，而來增進人類的生活，創造宇宙的生命。

三民主義倫理學既重生命的倫理，則須先肯定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圓滿和諧，再次求人類社會的完全進步。因而強調以「服務利他」為人類社會秩序的真正意義，其目的乃在「喚起人類清澈的心靈，培育高尚的品德，表現尊重人生的道德情操，而展露智慧才能以貢獻於社會，有所助益於人類社會的生存，建立起倫理的社會秩序，使得人人可與為善」（註一）。

先總統 蔣公對「倫理」有正確簡明的解說：「倫就是類，理就是紋理，引申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紋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羣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就是人對於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出行為的標準」（註二），由以上的解說，我們可了解，倫理乃是人與人相處的道理或規則，亦是做人的道理，其所內涵乃為「兼顧人類生命的正確與生活實踐的行為法式，以實現至善的理想」（註三），因此，可推知的倫理學，除重「知」以外，其主要目的在求「行」，所以倫理學乃被界定為「探討人生的理想和實現此理想之正當行為的科學」（註四）。

三民主義倫理學既求仁的表現，放其指標在求自愛而愛人，以「誠」為實踐倫理的動力，因而表現在「行」上，則必須發揮道德勇氣，推愛及人，以實現大同世界。而人之一生，必須生活於社會之中，在人類社會裏，須注重人與

人之間密切關係的羣體生活，故人在社會中所表現的行為，即為社會行為，亦即指「個人與別人或個人與團體交互影響的行為」（註五）。因此社會行為在倫理學上係「行」道德行為，如何使社會行為能合乎倫理規範，表現知仁行仁之行為，而發揮「服務利他」的倫理態度，實現人生理想，並進而促進世界大同，此可謂三民主義倫理學對社會行為之指標所在。

故本文針對探討三民主義倫理學與社會行為之關係，特以三民主義倫理學建立以愛心為基礎的「服務利他」之社會秩序為基幹，而從互助互信的社會態度，本乎仁愛的社會情操，祥和安寧的社會氣氛、規範秩序的社會道德及服務利他的社會行為，來探討角色認知的倫理、行為塑造的倫理、人際和諧的倫理、尊重生命的倫理以及自我實現的倫理。如此以演繹及發散思考之方法，來從事三民主義倫理學與社會行為的關係之探討。

貳、互助互信的社會態度——角色認知的倫理

人類社會乃是每個個人身份及角色扮演的場所，個人如何來表現合乎身份及角色的行為，以得到他人之認同，並合乎社會的文化規範，乃是角色認知歷程所應注重的倫理，由於個人處身於社會中，與他人及社會是息息相關的，故在尋求他人及社會的價值認同上，必須有一致性及共通性，才能產生和諧及調適的行為。

角色的扮演及行為的選擇，在動態的社會中，是呈多變項的顯現，所以首須內在的調和，即調適內在自我與外界內角色的一致性，再求外在行為能合乎「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方能被自己及他人所接受，否則甚易產生挫折感，所以探討社會態度之形成，必須先注意角色的認知歷程。

社會態度有三種成份，即認知的成份（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的成份（Feeling Component）、行動傾向成份（Action Tendency Component）（註六）。認知的成份，係由評價的信念所構成，係指個人對事

物的判斷而言。情感的成份則係指對事物好惡的感情而言，行為的傾向是指行為的準備狀態。由以上的解說，我們可了解，社會態度之改變，須由外在的順從性（Out Conformity）成為內在的順從性（Inner Conformity），才能使個人行為有「社會從眾性」（Social Conformity）（註七）。而角色扮演（Role Playing）被充當為一種技術，來作為社會態度之改變，是 Culbertson 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報告（註八）。即是由角色扮演的歷程而認知角色中適如其份的行為，因而產生內在順從性，而導致社會態度的改變。因此，我們了解角色之認知，如能以內在的互助互信的社會態度，則能使每個人基於互助同進步之心，而對社會上的一切產生信賴感及安全感。如此不管其所扮演之角色為何，其內心深處則充滿希望，對社會抱以積極面及光明面的看法，如此亦能互助互信的去追求幸福及美好的未來。故此種互助互信的社會態度，乃是角色認知的倫理所在，亦是每個人為促使社會進步及人類進化的原動力。

叁、本乎仁愛的社會情操——行為塑造的倫理

行為塑造的歷程，除了內有的道德規範之外，還要外在的法律制度來相配合。即個人行為之表現，除了符合道德之外，還需在法律之下不踰矩，如此方能使行為適如其份的表出。所以在道德行為方面，是積極的，而以勸善修德為其根本的使命，以良心的督責，來使人人勉力為善。而在法律行為上，是以「守分」為其原則，是消極的，以避免受制裁為其原則，至於人之為善與不為善，則屬道德行為，而非為法律所能強制。

但道德行為與法律行為亦有其共通的趨性：如一，二者皆為社會共同生活中，各人行為應守之規律。二，二者對於個人行為，或善、或惡、或是、或非，時加以判斷，或刑賞；三，二者俱以增進國家社會的安寧，人民之福利為目的（註九）。

行為之塑造及表出，不論其為法律行為或道德行為，如能本乎仁愛，則必能知仁行仁，博施濟眾，推愛及人。由合理的自私即自愛的情操，而推廣為愛人的情操。而我們了解「愛」是世界人類進化的動力，如每個人皆能發揮仁愛

之心，則必能成己成物，與人為善，而使社會充滿和諧及進步。

故行為之表現，若能出乎仁愛的社會情操，則必能以「誠」來行仁，而釋善固執，貫徹始終。如是，知道愛的道理，而來行愛的行為，才能由利己之心而至利他之心，而達成倫理實踐的行善，故此種本乎仁愛的社會情操，實是社會行為之塑造及表現出之倫理所在。

肆、祥和安寧的社會氣氛——人際和諧的倫理

人際關係的倫理，係指人類行為的當然法則以及人際關係的行為道德標準。由於個人生活於人羣之中，所以必有互動的情形發生，也就是人際關係之成立。而人際關係的建立良好，則在於每個人皆能表現出合乎身份之行為，以得到認同。

人際關係之和諧基礎，乃是要以客觀的態度來分析人際間正面與負面的關係，而能有所為有所不為，亦要注意動態的人際關係，不僅要由「我」為中心，來分析我的人際關係，以我之立場來衡量他人之立場，亦要站在他人之立場，為他人設想，了解他與我的關係。

了解每個人之天賦各有不同，才不會強人所難，自陷痛苦，亦不會逾越規範，而了解本質真實的人際關係。而人際關係之建立，其最有效及突出的方法為：（一）接受對方為「就是這樣的人」。（二）在語言溝通中，表示了高度「了解」對方的感覺。（三）雙方都能從接觸中，體驗到「安全感」（註十）。所以，在基本上，先尊重對方是一個人，是一個有能力解決自己問題的人。如是自尊而尊人，才能夠了解本質真實的人際關係。

社會上的人際關係能和諧，則必能使社會充滿祥和安寧的氣氛。每個人皆能認知真實的人際關係，則不會強人所難，亦能有所取捨，如此則不易與人產生衝突，同時由於自我之認知，則表出之行為就能符合個人之角色及他人之期望、社會的要求，如此才能自我調適。由於祥和安寧社會氣氛之建立，人與人之間充滿和諧互助，如是表現出人際關係的倫理。

伍、規範秩序的社會行為——尊重生命的倫理

由於「思想必須努力去表現倫理的本質，爲了達成這個任務，思想於是將倫理解釋爲一種對於人生的奉獻，並且是指受到尊重生命的信念，所鼓舞的人生」（註十一），此種尊重生命的信念，不僅使人們表現合乎規範秩序的社會行爲，亦可積極的促使人們表現良好的道德行爲。即在人生的過程中，堅持此種信念，而表現出倫理實踐的行善，來鼓舞人生，創造和諧美滿的人生，進而建立進步、完全的社會。

尊重生命的倫理，不僅要尊重自己的生存意志，同時亦要尊重他人的生存意志，如此在與別人之關係上；在社會行爲的表現上，才能表現出尊重生命的行爲，即表現出合乎規範秩序，進而表現出服務人羣、造福社會的行爲，因而有助於世道人心。同時此種尊重生命的倫理，亦可加諸我們以無限驚人的責任感，來促使我們對整個世界有極大的責任，產生民胞物與之感，而促使我們在遵守社會之規範秩序之外，亦應對大自然生態環境，遵守自然界的規範秩序，而成已成物，保持生態之完整及宇宙進化的完滿圓融。

因此，在個人行爲之表現上，由於每個人皆有私心，亦即自我中心的觀念甚重，所以必須要推廣此種尊重生命的倫理，來促使每個人由利己而產生利他的表現。由自我期待轉爲社會期待，由爲自己設想，轉爲服務他人，此才是尊重生命的表現。如此才可使「誠實待己的倫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轉變爲替別人獻身的倫理了」（註十二）。

所以，尊重生命的倫理，亦可以說是三民主義倫理學中，講求由內在仁心，表現人道精神，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羣之精神所在。故此種尊重生命，乃是人類內在的至誠，亦是人心善良的向上力量，而引導人類去實踐倫理，表現道德行爲，來服務人類，使人類獲得和諧圓滿的生活，並用來造福萬物，而使宇宙萬物，均能生命流暢，進化不已（註十三）。

陸、服務利他的社會道德——自我實現的倫理

個人自出生以後，由本我到自我到超我的形成，使自我在本我及超我之要求下，而表現出社會行爲，使得自我得到實現與發展。因此，自我必須在本我及超我之協調下，產生適如其分的外在行爲表現。

若以需求層次來說明，則可見於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Abraham

Maslow's theory of effectualization），它將需求分爲五個層次，由下而上爲：（一）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二）安全的需求（security needs）、（三）愛與歸屬感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四）自尊的需求（self-esteem needs）、（五）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註十四）。

故在此種層層上昇的需求上面，我們必須對自我實現作一番了解，方能與服務利他的社會行爲找出其關聯性。自我實現之性質可界定如下：（一）知覺（awareness）、（二）自由（freedom）、（三）誠實（honesty）、（四）信賴（trust）。所謂知覺，係指對個人本身內在世界的真實認知。而自由，係指對於尋求獨立、創造及自然的自由。在誠實上，則指允許人們了解其本身之感覺，並加以信賴其感情領域之情緒表現。在信賴上，則指信賴自己、他人、生命及自然（註十五）。

由以上之分析，我們了解一個自我實現者，乃是一個能利用本身之感覺及情感，並能加以信賴的自我實現及發展之歷程的人。如此的自我實現，實已真正認清自我與環境，而能發揮其潛力，並產生服務人羣、扶持他人及造福社會的行爲。其有能力去從事理想之激發及實現，並促使其他人亦能發揮其本身之潛力，而促使人類進化、社會發達及文明進步。

故此種自我實現的倫理，表現在社會行爲上面，乃是服務利他之社會道德。因此，國父在「世界道德之新潮流」的演講中說：「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意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才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服務，這種替衆人服務的新道德，是世界上最道德的新潮流」。可見一個自我實現、具有愛心的聰明才力者，必發揮此種服務的道德心，來促使人類社會之進步發展。

因此，我們了解自我實現的倫理中，行爲道德之標準，乃在於此種服務利他造福的道德，此種服務利他的道德，是指示人類生存的道理，即用仁愛的德性、合作的誠意，服務的精神，去爲人類謀福利。每個人皆能抱持此種服務利他的社會道德，則必使人與人之間關係和諧，相互尊重，互助互信，而推己及人，表現出倫理實踐的至善，對人類社會有良好的貢獻。

柒、結 語

倫理學乃是研究合理的行為規範，以實現人類生命理想，達成至善的目的和理想。所以必須一方面提出正確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必須提出實現此理想之正道及方法。換句話說，除了知以外，還須求行。能知仁而行仁，才是真知真行。能真知及真行，則必能貫徹始終，而使倫理得以真實實踐。

道德行為的培養，須注意動機與結果。所以社會行為之表現，除了在法律制度之下，表現出守分守法之行為之外，我們更要求積極的道德行為表現，使人皆能去從善及與人為善，表現出服務利他的道德行為出來。三民主義倫理學根據中國傳統思想，以仁愛為基礎的社會道德，所以表現出在實踐上，即是從「誠」而發出的行仁，亦是一種「利他」的行為表現，不僅可將個人生命積極的開展，同時亦使人類生命的意義及生命之價值，得以充分的發展及實現。國父「服務利他」的倫理及先總統 蔣公「增進人類生活，創造宇宙生命」的倫理，實使我們了解三民主義倫理學強調之互助、服務、力行，皆為行仁的表現，我們亦知「力行的結果，是仁的普遍圓滿的實現，使宇宙人類之生生不已，實為人生意義的充分實踐」(註十六)。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社會行為之表現，除了要充分實踐人生意義，同時亦要表現出博愛的人生觀，來使得人格完美的呈現，每個人皆能盡職盡責，與人為善；而在互助、服務及力行之原則下，來解決人類社會的種種問題。

所以三民主義倫理學「服務利他」與「尊重人生」的社會道德，是指示社會行為表現之指標。人人能先肯定自身的存在，則先表現出肯定的生命價值，再切實力行，「服務利他」「尊重人生」的原理，並本著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及與人為善的精神，則可在社會行為之表現上呈現廓然之胸襟，並建立起「服務利他」的人類社會秩序。如是人人奮勉向上，日趨於善，達乎至善。

【附註】

- 註一、黃師奏勝：「三民主義倫理學」，(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三三四頁。
- 註二、先總統 蔣公：『政治的道理』，見『蔣總統言論選集』(政治與經濟)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出版)十七頁。
- 註三、同註一，九八頁。
- 註四、謝幼偉：『倫理學大綱』(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年九月，臺初版)四頁。
- 註五、張春興：『心理學』(下) (臺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初版)四五頁。
- 註六、鄭瑞澤：『社會心理學』(臺北，中國科學行為社，民國六十九年三月

，初版)一一一頁。

註七、同註五，四六八頁。

註八、Barry E. Collins: Social Psychology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Reading Massachusetts) 1970 年版 p. 146。

註九、范錫：『倫理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五月，臺八版)二十九頁。

註十、韓幼賢：『當代心理學理論』(臺北，中央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增訂版)三二〇頁。

註十一、史懷哲著，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臺北，志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初版)一三五頁。

註十二、同前註，一三九頁。

註十三、同註一，二一七頁。

註十四、Barbara Engler: 「Personality Theorie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79 p.338。

註十五、同前註，三四三—三四九頁。

註十六、同註一，一八三頁。

參考書目：

- 一、黃師奏勝：『三民主義倫理學』(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
- 二、蔣總統言論集(政治與經濟)(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出版)
- 三、謝幼偉：『倫理學大綱』(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年九月，臺初版)。
- 四、張春興：『心理學』(下)(臺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初版)。
- 五、鄭瑞澤：『社會心理學』(臺北，中國科學行為社，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初版)。
- 六、Barry E. Collins: Social Psychology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Reading Massachusetts) 1970。
- 七、范錫：『倫理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五月，臺八版)。
- 八、韓幼賢：『當代心理學理論』(臺北，中央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增訂版)
- 九、史懷哲著，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臺北，志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初版)
- 十、Barbara Engler: Personality Theorie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79。